

# 最後的綠洲

## ——今天的日本新村

• 董炳月

無論是在現實層面上還是在精神層面上，新村都是名副其實的綠洲。

——題記

—

2004年7月29日因事去東京，8月4日即返回北京。旅程僅有短暫的一周，但其間特意到埼玉縣入間郡毛呂山町的新村住了一晚。

上次參加新村的活動還是1996年5月初的黃金周，與村裏的森田哲郎老先生、高橋久子女士、藤田輝美小姐以及幾位村外的日本年青人去埼玉縣的飯能市打保齡球。當時我正在東京留學，研究周作人(1885-1967)、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兩位作家從新村運動倡導者向「大東亞戰爭」合作者轉變的思想過程，於是自然而然地走進了新村。1998年9月適逢新村創建八十周年，村裏寄來了紀念慶祝會的通知，但當時留學生活即將結束，忙於回國前的種種瑣事，最終沒能去參加。同年11月即回國，但回國之後時常記起新村。這不僅是因為書櫃裏擺放着新村運動創始人、白樺派領袖武

者小路實篤的著作，更主要的是因為對於中國來說新村運動的意義非同尋常——這種意義是在日本國內也不曾有的。新村精神是中國現代思想的原點之一，對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的社會實踐發生了深遠影響。回國之後曾因工作關係去東京，但工作繁忙，居然沒有機會去新村，以至於與村人的聯繫都中斷了。這次旅行日程相對自由，終於能夠在相隔八年之後重訪新村。

村外人員到新村住宿需要預約，所以，去東京之前我給新村理事長石川清明先生寫了信，拜託他安排住宿事宜，並要求參加8月1日的新村例會。新村一年間有八次大型固定集會，包括評議會、賞花會、勞動節、實篤誕辰慶祝會、新村創立紀念日集會，等等。此外，每月(1月除外)第一個星期日的下午舉行月例會，每周四晚上則有木曜會(在日語中星期四謂之「木曜日」)。大型集會在毛呂山

1996年5月初，當時我正在東京留學，研究周作人、武者小路實篤兩位作家從新村運動倡導者向「大東亞戰爭」合作者轉變的思想過程，於是自然而然地走進了新村。對於中國來說新村運動的意義非同尋常——這種意義是在日本國內也不曾有的。新村精神是中國現代思想的原點之一，對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的社會實踐發生了深遠影響。

第一次到新村堂是1996年4月下旬某個星期四的黃昏，來到新村堂門前，看到的是一座門面只有大約五米寬的破舊的二層磚木建築。門窗、牆柱的油漆都已經剝落，只有門上方橫木樑上隱約可見的「新しき村」（新村）幾個字標誌出這座老房子在日本近代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位置。於是切身感覺到曾經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新村運動已經時過境遷。

的新村舉行，月例會與木曜會的地點則是東京神保町的新村堂。8月1日正是當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我計劃先參加下午新村堂的月例會，然後去新村。

認識石川先生是1996年4月下旬在新村堂的木曜會上，接着又在五一勞動節隨他去新村參觀，在村裏住了一夜。初次見面時，他送給我一冊印製精美的《小提琴手的誕生——石川靜的足跡》（ヴァイオリニスト誕生——石川靜の足あと）。那是他的著作，出版者為皆美社（新村出版社），版權頁上有他的個人簡歷。石川先生生於昭和四年（1929），昭和十九年（1944）十五歲的時候成為日本海軍甲種飛行預科練習生，所幸未上戰場戰爭即結束。他在戰後接近實篤，參與新村運動，在埼玉縣的新村住過大約三年。石川靜是他的女兒，受他影響四歲即開始學習小提琴。1966年十二歲的石川靜參加第二十屆全日本學生音樂大賽，榮獲小學生組第一名，1969年十五歲的時候獲得日本第十六屆文化廣播音樂獎，同年參加布拉格青少年國際廣播音樂競賽榮獲第一名，1972年參加烏尼耶夫斯基國際小提琴競賽獲得亞軍，成為享譽日本國內外的小提琴手，輾轉歐美各地參加演出。石川靜出生的時候石川清明夫婦正在村中生活，某種意義上石川靜是新村之子，因此她的成功讓新村創始人實篤備感高興。1973年1月，八十八歲的實篤特意为石川靜寫了一首詩，詩題就是《石川靜小姐》（石川靜さん）。

8月1日午後1點半，我站在神保町書店街八木書店對面的街邊，等待石川先生來接我去新村堂。新村堂在書店街附近的一條巷子裏，從前只在晚上去過兩次，位置已經記不清。而且，新村堂好像已經在1999年前後被

改建。一會兒，石川先生出現在街對面。如他在電話裏所說，戴着一頂惹眼的紅色棒球帽——他上午剛去打了棒球。七十五歲高齡，依然健康開朗，和七八年前相比看不出太大的變化。離開書店街，過了一個十字路口，走進一條小巷，來到一座嶄新的、外牆貼着灰白色馬賽克的十幾層高樓前，石川先生說「到了」。那一刻，記憶中搖搖欲墜的新村堂忽然消失，淡淡的滄桑之感在心頭瀰漫開來。

第一次到新村堂是1996年4月下旬某個星期四的黃昏，為了了解木曜會的情形。按圖索驥、走街穿巷來到新村堂門前的時候，看到的是一座門面只有大約五米寬的破舊的二層磚木建築。門窗、牆柱的油漆都已經剝落，露出陳舊的黑褐色，只有門上方橫木樑上隱約可見的「新しき村」（新村）幾個字標誌出這座老房子在日本近代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位置。晚風從巷子裏吹過，街上方窄窄的天空一彎新月，都市的噪聲從遠處傳來，於是切身感覺到曾經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新村運動已經時過境遷。推門，無人應，才發現門是鎖着的。那種老式掛鎖在中國的城市裏也已經不多見了。大概是因為沒到木曜會開始的時間吧。回到書店街轉了一圈回來，二樓的窗戶上果然映出燈光，門上的鎖也被打開了。大喊了幾聲，有回應聲從樓上傳來，於是推門進去。推開門，面前是一道窄窄的樓梯。原來二樓和一樓是分開的，二樓的入口也在一樓，進門就得爬樓梯。木製樓梯很窄，沒有專用的照明燈，藉着二樓房間入口處漏出的燈光，一步一步沉重地踩上去，在隱隱約約的灰塵味道中有了長途跋涉的感覺。二樓的面積大約三十平方米，木地板踩

上去似乎在打顫。正面牆上掛着一塊刻有「新村堂」三個字的木製扁額，牆角堆放着一些舊傢具。燈光有些暗，三位老先生和一位年輕人正圍坐在一個矮炕桌前整理信封，好像是要把剛出版的《新村》雜誌寄出去。三位老先生一位是石川清明，一位是作家原田耕作，一位是從日本鐵路公司退休的島村豐，年輕人則是石川先生退休前所在公司的下屬。四位都是新村的村外會員——新村會員分為兩種，入村生活者為村內會員，贊同新村精神而未入村生活的社會人士為村外會員。新村堂的那座老房子應當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後來聽石川先生說，房子太老了，正準備改建，計劃與鄰家一起提供地皮，讓其他公司出資建樓，土地所有者出讓建築物的部分使用權。確實，在寸土寸金的東京市內的繁華區，一座破舊的二層小樓佔着那樣一塊地皮很可惜。現在，眼前這座十幾層的高樓就是在新村堂的原址上建起來的。

新村堂在八層，有電梯直通。房間依然是大約三十平方米，但裝修一新，窗外視野開闊。靠牆的書櫃裏放着實篤的作品以及與新村相關的書籍、雜誌，書櫃上面橫放着刻有「新村堂」三字的木製扁額，那顯然是從舊建築中取過來的。有了這塊扁額，新村八十多年的歷史就在這座新建築裏延續了。

兩點過後，月例會開始。到會者八人，均為村外會員，其中五人是家庭主婦。又見到了島村豐先生，但原田耕作先生已經在兩年前去世。我記起家中的書櫃裏還放着原田贈送的兩本書。島村精神勁兒十足，但眼睛已經不好用。他把自己剛出版的新著《某詩人的回憶》（ある詩人の思い出）送給我，簽名的時候拿出了隨身帶的放

大鏡。隔着放大鏡才能把字寫得清楚。石川先生首先介紹了即將開始的新村勞動節的情況。新村的勞動節在每年8月的第一個星期日至第二個星期日舉行，其間多有中小學生去參觀、進行勞動體驗。新村採用自然種植法，稻田不用除草劑、農藥之類，雜草叢生，所以除草勞動有些辛苦。松下道代女士說起用鐮刀割草的體驗，有些興奮，繪聲繪色：「割草的時候，一直那麼蹲着，累得不得了。可是，大自然完好地保存着哪。稻田裏有烏龜，有泥鰍，晚上還能看到螢火蟲。螢火蟲在飛，很漂亮啊！」石川先生回憶起當年在村中生活的情形，說那時候村裏最艱苦的勞動也是除草。幾位主婦中稻葉江利加最年輕，有一個上中學二年級的兒子，學校讓學生自行安排社會實踐活動，她說準備讓兒子到村裏住兩天，參加勞動體驗。石川先生告訴她聯繫方法，並說勞動節期間自己會帶孫女去參加勞動。各位輪流發言之後石川先生做總結，指出儘管有人認為新村是黨派，但他不這樣認為，強調說充分發揮個體生命的自覺性、達到社會的協和是新村的最終目的。這種說明也許主要是對我這個中國人進行的。閒談的時候，主婦岩月槿子說她曾與丈夫一起到北京旅遊，住在鼓樓附近的賓館裏。有中國人問她東京的家在甚麼位置，她回答說在東京北部，對方便說：「你是住在仙台北吧。」仙台北距東京約三百公里，她開始不理解東京北部何以引起中國人關於仙台的聯想，後來才知道那種誤解是魯迅的〈藤野先生〉造成的。許多中國人讀過〈藤野先生〉，知道魯迅是從東京往北去仙台，在仙台留學的時候認識了藤野先生，卻不清楚東京與仙台之間的距離。

岩月槿子說她曾到北京旅遊，有中國人問她東京的家在甚麼位置，她回答說在東京北部，對方便說：「你是住在仙台北吧。」仙台北距東京約三百公里，她不理解東京北部何以引起中國人關於仙台的聯想，後來才知道那種誤解是魯迅的〈藤野先生〉造成的。許多中國人讀過〈藤野先生〉，知道魯迅是從東京往北去仙台，卻不清楚東京與仙台之間的距離。

四點過後月例會結束，眾人一起離開新村堂，在樓下分手。我乘地鐵去新村，手提的大紙袋子裏有島村先生的書，還有石川先生贈送的《在新村生長——追求自他共生四十五年》（新しき村に生きる——自他共生を求めて45年）與一張珍貴的舊照片。《在新村生長》是村中長老渡邊貫二先生的著作，1993年由新村印行；照片上的風景則是九州石河內的新村，入倉佐一攝於大正十三年（1924），上面標明「宮崎日日新聞社提供」。

石河內是日本新村運動的發祥地。大正七年（1918）9月20日，三十三歲的實篤離開東京西行，經大阪往九州尋找建設新村的土地，途中在各地演說，宣揚新村精神。11月14日決定了九州宮崎縣日向山區石河內的土地，這一天因此成為新村創立紀念日。青年實篤對於「人類意志」的忠誠，追求新生活的激情，以及那種青春煥發的姿態，都是「大正浪漫」的註腳。但九州遙遠，去新村很不方便。1919年7月上旬周作人從北京前往日向訪問新村，在門司上岸後先是乘火車，然後坐馬車，接着步行、爬山，又逢大雨，旅途漫長，頗為艱辛。此事在其〈訪日本新村記〉（1919年10月《新潮》二卷一號）和實篤當時的夫人

武者小路房子的〈周先生〉（周さん）（《新村》1919年8月號）一文中都有記述。昭和十三年（1938），由於宮崎縣在新村附近建水庫，新村的土地大部分被水淹沒，新村同人便在東京西北方埼玉縣入間郡的毛呂山購買了二十多畝荒地，開始建設「東村」。戰後，「東村」的面積和規模日漸擴大，而日向的新村因為土地面積小人口少而近於名存實亡。1954年經實篤提議，毛呂山的「東村」改稱「新村」。毛呂山距離東京只有不到兩個小時的車程。

## 二

從神保町去新村，中途要由地鐵轉乘電車，頗費時間。在新村旁邊的武州長瀨站下車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西邊是稚父山區，山巒起伏，黛色的山體輪廓清晰地映在晚霞輝映的橙色天空。繞過武藏野陵園，穿過一個住宅區，從mama·mart（太太商場）旁邊的斜坡下去，新村便出現在眼前了。與高高低低的房屋構成的住宅區形成對比，新村是一大片茂密的綠色。進入綠色區域，走在田埂上，周圍的空氣倏忽之間清涼起來。田邊草叢中有水在流，水聲清晰。

石河內是日本新村運動的發祥地（圖）。1918年9月20日，三十三歲的實篤離開東京西行，經大阪往九州尋找建設新村的土地，途中在各地演說，宣揚新村精神。11月14日決定了九州宮崎縣日向山區石河內的土地。青年實篤對於「人類意志」的忠誠，追求新生活的激情，以及那種青春煥發的姿態，都是「大正浪漫」的註腳。



夜幕降臨，村裏昏黃的路燈已經亮起來。路還是八年前走過的那條路，時間在新村似乎是靜止的。養雞場雞舍的窗口射出明亮的燈光，能聽到雞群啄食的噪雜聲。到公會堂的時候已經七點多，只有渡邊修和渡邊尚老夫婦倆在那裏洗餐具、收拾廚房。我寫給石川先生的信釘在大廳一角的告知板上，旁邊寫着「8月1日董炳月兄來村一泊」。「兄」為新村會員之間約定的稱謂，表示平等與尊重，「一泊」意為漢語的「住一宿」。公會堂位於新村中央，是村裏最大的建築物，由三部分構成：中間是大廳，西側是舞台，東側陽面為廚房、陰面為浴室。公會堂兼有食堂、會議室、文娛室等多種功能，吃飯、開會、紀念演出都是在這裏，周圍的牆上掛着實篤的畫像以及美術作品。渡邊尚老媽媽說剛才幾位村內會員在那裏等我，等了半天人未到，先回去了。於是我獨自取了飯來吃。晚餐是米飯、豆瓣醬湯、炒茄子、納豆（煮熟之後發酵的黃豆），地道的日本料理。新村的伙食是統一供應的，標準的「大鍋飯」，有專人負責炊事工作。飯做好之後放在廳裏，大家可以在這裏吃，吃完了自己收拾餐具放在廚房與大廳相聯的一個窗口，也可以各自取回住所吃。那很像中國大躍進年代的食堂。吾生也晚，沒趕上大躍進的輝煌年代，僅僅從母親的敘述中對當時的食堂有個簡單的了解。八年前第一次走進新村公會堂的時候，我居然有一種進了人民公社食堂的感覺。

正在吃飯，一位男士從浴室出來，和我打招呼：「是從中國來的客人吧。你以前來過，我記得的。」他剛洗了澡。閒談起來，知道他名叫本間健史，昭和十八年（1943）生於京都，已經六十一歲。昭和三十八年

（1963）二十歲的時候受實篤《土地》、《新村問答》（新しき村についての對話）等著作的影響，對新村發生興趣，入村生活，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他說現在村裏主要是依靠養雞、種植水稻以及採茶生活，本來還有陶器製作和鮮蘑種植等等，但因為人手少，都停止了。他和另外兩名村內會員的工作就是養雞。想起進村時路邊燈火通明的雞舍，問他晚上是否依然在工作，他說不是，僅僅是讓雞舍的照明燈開着罷了。每天大約十六個小時的照明最利於雞產卵，所以燈要亮到夜裏十一點左右。他很欣賞中國古代的美術、陶瓷工藝，問我為甚麼現在的中國不行了。我告訴他中國現在同樣有許多優秀的美術、工藝作品，建議他到中國看一看。他對自己的生活狀況似乎不滿意，說現在村裏不具備讓村內會員出國旅遊的條件。財產公有，每月只能領三萬五千日元的「個人費」。他和妻子容子在村內生活，三個孩子均未留在村裏，而是在村外工作。說話間一位青年人走了進來，腳穿長筒雨靴，淡綠色的襯衣束在西褲裏，脖子上圍着條白毛巾，四方臉膛，腰板筆直，精神抖擻。從他身上我猛然感覺到了新村的青春氣息。他取了飯來，坐在旁邊的一張桌子旁，一邊吃，一邊打開大廳一角的電視觀看，又從舞台前面的報架上取了報紙翻閱。本間說：「他是日比野英次。村裏的事情別只問我，也問問他。」我起身打招呼，沒想到日比野先生說：「您是董先生吧。我給您回了電子郵件。」原來我寫給石川先生的信寄到村裏的時候石川先生不在，是他代為處理的。但我那幾天身在旅途，沒有上網查郵件。他說呆會兒去村外會員之家，吃完飯先回去了。

吃了飯、洗了澡，跟着渡邊尚老媽媽去村外會員之家。出了公會堂，

新村的伙食是統一供應的，標準的「大鍋飯」，有專人負責炊事工作。飯做好之後放在廳裏，大家可以在這裏吃，也可以各自取回住所吃。那很像中國大躍進年代的食堂。吾生也晚，沒趕上大躍進的輝煌年代，僅僅從母親的敘述中對當時的食堂有個簡單的了解。第一次走進新村公會堂的時候，我居然有一種進了人民公社食堂的感覺。

日比野英次放棄大學教職入村生活至今已兩年多。入村之後面對村中「絕望的停滯」，他感到了幻滅。他認為「人的生活」這一新村理想目前尚未實現，某些入村者是因為在社會上受了挫折而把新村作為避難所。不過，感到了幻滅卻並未絕望，日比野希望通過網絡等現代傳媒手段向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發出信息，改變現在這個充滿暴力和貪欲的世界。

夜色中蟲鳴伴着涼風從四面傳來。新村之夜太安靜了。圓圓的月亮正從東天升起，茶園、房舍、遠遠近近的樹木都籠罩在朦朧的月色中。不遠處是新村正門，正門外是八高（八王子至高崎）鐵路線。一列電車轟鳴着快速駛過，明晃晃的燈光巨爪似的從每個車窗伸出，列車變成一條透明的巨型蜈蚣。轟鳴聲過後，蜈蚣消失，一切歸於沉寂。

村外會員之家是一座獨立的日式平房，專為村外會員準備的，住一宿食宿費僅一千日元。現在全日本共有村外會員三百多名，經常有人到村裏來。高橋久子正在收拾房間，還準備了幾罐啤酒和水果、點心。不一會兒日比野英次如約來談。他已經四十四歲，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聊起來才知道他是一位留美歸國的哲學博士。1984年去美國留學之前他是東京名校立教大學的學生，碩士論文做的是黑格爾(G. W. F. Hegel)。留美五年，1989年回國後在日本中部岐阜縣一所短期大學講授宗教哲學。學生逃學等日益嚴重的日本社會問題促使他思考「何謂真正的人的自立」這一根本問題，他開始接觸歐文(Robert Owen)、傅立葉(Charles Fourier)的烏托邦思想，梭羅(Henry D. Thoreau)的「森林生活」，以及日本作家宮澤賢治的農本主義、實篤的新村。得知大正時期開始的新村運動依然在持續，便於2001年5月第一次訪問了新村，隨後放棄大學的教職入村生活，至今已兩年多。不過，入村之後面對村中「絕望的停滯」，他感到了幻滅。他認為「人的生活」這一新村理想目前尚未實現，某些入村者是因為在社會上受了挫折而把新村作為避難所。他說：「50年代之前的新村在經濟方面一直需要創始人實篤的資助，而60年代養

雞獲得成功主要是借助當時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不過，感到了幻滅卻並未絕望，日比野希望通過網絡等現代傳媒手段向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發出信息，大家聯合起來，改變現在這個充滿暴力和貪欲的世界。談話之間森田哲郎先生和名叫倉敷幸兒的青年來了。年逾古稀的森田先生依然是白髮如雪、面色紅潤，我想那也許是得力於新村精神的陶冶與新村優美的自然環境。他交給我幾張照片，是在飯能市打保齡球的時候拍的，他居然保存了八年。照片上有藤田輝美，美麗、文靜的面龐，眉宇間瀰漫着淡淡的憂鬱。問起來，森田先生說她已經在幾年前離開新村，現在失去了聯繫。本以為這次能見到她。藤田輝美出生在埼玉縣北面的檜木縣山區，當時只有二十四歲，是村內最年輕的會員，負責在村內的小商店賣東西。她在《新村》上發表過〈給家人的信〉(家族への手紙)，在信中講述了童年的心靈創傷與她入村的關係。父親體弱多病，母親生活壓力大，性格不好，時常對她進行體罰，甚至把她的頭按在裝滿水的盆裏……。倉敷幸兒二十七歲，是最年輕的村內會員。他到來之前日比野已經說起他的事情。他大學畢業之後換過幾次工作，苦於對人生意義的思考，年紀輕輕就考慮過自殺。所幸他的母親是村外會員，他在閱讀了實篤的作品之後對新村精神產生共鳴，入村生活已近兩年。十二點過後，四位村內會員才離去。奔走一天有些疲倦，我也從壁櫥裏取出被褥就寢。

### 三

一覺醒來，陽光已經穿過推拉門的玻璃照在榻榻米上。洗漱之後走出



新村正門兩邊樹立着兩根木柱，上書「入此門者必須尊重自己與他人之生命」（圖）。2004年我到訪新村時，二十七歲的倉敷幸兒是最年輕的村內會員。新村確實「衰老」了。村內會員已經減少到二十五人，而其中年過花甲者多達十六人，五十歲以下的只有五人。日向的新村目前只有兩戶四人，且關係不好，已經不成其為「村」。

門去，早晨的新村和夜晚的新村一樣安靜。風景如舊。正門兩邊還是那兩根木柱，上書「この門に入るものは自己と他人の生命を尊重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入此門者必須尊重自己與他人之生命）。不遠處公會堂旁邊立着村旗，村旗下種着一片向日葵。在綠色的新农村中，向日葵金黃色的花瓣熱烈又浪漫。公會堂裏，渡邊修夫婦已經將早餐預備好了。他們應當起得很早。我知道渡邊是一位畫家，浴室裏的壁畫是他畫的，早餐之後去浴室拍了兩張照片。渡邊又指着舞台說：「那都是我畫的。村旗下面的向日葵。」原來舞台周圍放滿了正在晾曬的水彩畫，是用和紙（日本紙）畫的，每一幅約有半張寫字枱枱面那樣大，畫上全是向日葵。我說：「有點梵高的感覺哪」，渡邊不客氣地回答：「我比梵高畫得好！」他讓我挑了一張喜歡的，簽了名送給我，並認真地用舊海報捲起來。和紙潔白、厚實而又柔韌。日比野正在公會堂的耳房（那是新村事務室）處理事務，看到我，便打開電

腦，打印為我準備的新村資料，包括我尚未讀到的郵件和他的個人簡歷。不愧是當過大學教師的，做事很有條理。從他提供的材料來看，新村確實「衰老」了。村內會員已經減少到二十五人，而其中年過花甲者多達十六人，五十歲以下的只有五人。日向的新村目前只有兩戶四人，且關係不好，已經不成其為「村」。新村勞動力嚴重不足，甚至古稀之年的森田先生也不能「退休」，還要擔任新村美術館館長。當天是星期一，按常規美術館閉館，但森田先生特意來開門，讓我參觀。與新村的樸素、原始相比，美術館頗為現代化，展櫃、燈光、宣傳海報都很精緻。這裏保存着實篤與新村會員們創作、收集的美術珍品，價值連城。

參觀了美術館，我去大信莊看望渡邊貫二先生。這次能見到渡邊先生我感到欣慰。渡邊先生生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生日與現在的日本天皇一樣——12月23日。1996年五一勞動節在村裏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八十

六歲。當時我幫助村裏砍樹、挖竹筍，他在旁邊閒談。他戰爭年代被徵召，是日軍的一名炮兵，到過宜昌等地。他說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侵略，又說實篤雖然在戰後受到開除公職的處分，但戰爭中多次拒絕軍方的講演邀請。他還告訴我他見過崔萬秋，戰後崔萬秋曾多次與實篤一起到村裏來。崔萬秋是日本通，30年代大量翻譯日本文學作品，抗戰時期在中國政府的國際宣傳處做情報工作，但建國前夕隨國民黨去了台灣，大陸知道他的人已經不多。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渡邊先生去參觀過，他認為人民公社的公有制是正確的，問題出在沒有解決好人民的生活需求。八年過去，老人已經是九十四歲高齡。

渡邊先生的住所名叫大信莊，實際只是一座平房，好像只有四個房間。站在門前，隔着紗門，我看到老人無聲無息地坐在榻榻米上的小矮桌前。高喊了幾聲，他才有反應，吃力地說「請進來！」果如村人所說，他的耳朵幾乎聾了。拉開紗門進去，看到的是一位骨瘦如柴、目光呆滯的老人。小矮桌上放着半杯牛奶，有一些牛奶灑在桌面上。沒有子女，妻子已去世多年，他是一個人生活。看我進去，他掙扎着要站起來，我攔住了他。他好像已經不記得我，但聽說我是從中國來的，眼睛立即放出光來，大聲說：「啊，中國和我們像兄弟一樣。北京，我去過的。還爬上了萬里長城。」說着有些喘息，停了下來。一會兒又說：「從前，村裏有過很困難的時期。可是現在，變好了。我哪，想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現在只是安靜地等死。」正常的談話很難進行，我請他在《在新村生長》上簽了名，又徵得他的同意拍了幾張房內的照片，便告辭了。後來閱讀《在新村生長》，知

道渡邊先生昭和三年(1928)就在東京有樂町的新村集會上成為新村會員，深受實篤《自己的人生觀》(自分の人生觀)與《人生論》等著作的影響。戰後第二年(1946)4月入村生活之後，他視實篤為唯一的人生導師。

十一點已過，下午與東京的朋友還有約，我便到村外會員之家取了行李，去公會堂與各位告辭。午餐已經開出來，渡邊修熱情地攔着我，要我吃了飯再走，但時間來不及，無法接受他的好意。日比野英次開來一輛深藍色的麵包車，送我去車站。以前離開新村或者來新村，都是步行從村後的田間小路出入，這次乘車，倒是第一次走正門。車中，日比野又說起新村面臨的問題以及相關人士在新村發展方向方面的不同意見。請他舉例言之，他說：「上次石川先生要把實篤的一幅畫買回來，收藏在新村美術館裏。買那幅畫要花兩百萬日元，但靠養雞賺兩百萬可不容易。我覺得錢不能這樣用，也沒有必要把實篤的作品都收回來。」實際上，新村內部的一些問題連我這個局外人都看得出來。當務之急是用制度化的形式處理財產與慾望、生存與生活、內在理性與外在規則之間的關係。當然，新村精神的核心是「信託人間的理性」(周作人在〈日本的新村〉中的概括)，反對強制與命令，一切從個人的自覺性與主動性出發，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理性如果不通過規則體現出來就很難獲得穩定性。在這個意義上，「信託人間的理性」或許是新村的致命弱點。我說：「日比野先生的入村對於新村來說是個轉機。新村也許不久就會發生一些大的變化。我有預感。」這並非客套話。在日比野給我的材料中，有他回答來訪者提問時對新村現狀的具體介紹，有他對新村精神的解釋，

新村內部的當務之急是用制度化的形式處理財產與慾望、生存與生活之間的關係。新村精神的核心是「信託人間的理性」，反對強制與命令，一切從個人的自覺性與主動性出發，但在現實生活中，理性如果不通過規則體現出來就很難獲得穩定性。在這個意義上，「信託人間的理性」或許是新村的致命弱點。

還有他起草的新村生活規則。這是將處於自然、自發狀態的新村生活規範化。不僅如此，他還從哲學層面上對實篤的新村進行再認識。巧合的是，日比野的母校立教大學也是周作人的母校，而實篤劇作《愛慾》、《畫室主人》(ある畫室の主)中也有一位名叫英次(野中英次)的主人公。這種巧合給了我一種宿命感。

在武州長瀨車站前的停車場上與日比野分手，他的麵包車開上公路，匯入公路上行駛着的大小車輛之中。看了一下手錶，11點43分。正午的陽光明媚地照着，遠方稚父山區的山巒在陽光的輝映下呈現出一片蒼茫的綠色……。我在心中暗暗地為日比野英次祈禱，為新村祈禱。

#### 四

新村無疑是武者小路實篤最大的一件「作品」。在日本近代作家中實篤並非最著名，但是，像他這樣將自己的思想實體化並將這實體留給日本社會的作家幾乎沒有。新村自誕生至今八十六年，歷盡坎坷。實篤本人在石河內的新村生活了七年，大正十四年(1925)12月就因為家庭問題離開了。創始人離村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表明了新村與現實社會之間無法割斷的聯繫，也標誌着新村尚無法戰勝它所否定的現存社會秩序。其後，不斷有憧憬新村、入村生活的人離開新村。現任理事長的石川清明先生也是一位曾經在村裏生活過但最終回到社會上來的村外會員。不過，在不斷有人離開新村的同時也不斷有人進入新村生活，新村因之得以存在至今。這表明了新村一直保持着對於現實社會的否定性與批判力。新村的價值，或許就



存在於這入村與離村的張力之間。在這個意義上，只要「新村的精神」存在，新村就存在着。它的人類意識與和平精神，它的「自他共生」觀念，它對自然的尊重，確如實篤所言，體現的是「人類的意志」，具有永恆的價值。

五四時期周作人對新村運動的倡導直接影響到了李大釗、恽代英等早期共產黨人，甚至影響到青年毛澤東。周作人1920年4月7日日記記有「毛澤東君來訪」。那正是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四號上刊載了「新村北京支部啟事」一周之後，毛澤東的來訪顯然與新村運動有關。正是在同一時期，毛澤東探討了在嶽麓山下建立工讀同志會的可能性。當時，新村運動的宣傳與社會主義的倡導是交織在一起的。三十年後毛澤東締造的新中國，某些方面也打着新村的印記——比如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形式，以「自我批評」為標誌的對於人類理性的信賴，全社會的泛藝術化，等等。遺憾的是社會體制本身出了問題，以至於「全天命」、「自他共生」的理想都未能實現。我身為中國人而無法忘卻日本的新村，原因之一或許是自己曾經生活在一個巨大的、變形的新村之中。

董炳月 東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新村無疑是武者小路實篤最大的一件「作品」，像他這樣將自己的思想實體化並將這實體留給日本社會的作家幾乎沒有。五四時期周作人對新村運動的倡導直接影響到了李大釗、恽代英等早期共產黨人。後來毛澤東締造的新中國，某些方面也打着新村的印記。圖為1943年8月周作人(左)訪日，與實篤見面。